理论聚焦

未来五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刘树成

编者按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不稳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远未消除，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界对未来5年我国经济走势的讨论成为社会热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围绕我国经济形势，对未来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判断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情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呈现出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

首先，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在成功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回升到高峰，为11.9%。随后，逐步下滑。在2010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间，曾有6个季度GDP增长率回稳在9%左右。但进入2012年后，又进一步回落，第一季度降为8.1%，第二季度跌破8%，降到7.6%（上半年为7.8%），第三季度又降为7.4%，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4个季度中的最低增幅。

当前我国经济环境新变化

其次，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在成功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10年1至2月份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回升到高峰，为20.7%。随后，逐步下滑。在2010年6月至2011年12月间，曾有19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回稳在13%左右。但进入2012年后，又进一步回落，4月至9月连续6个月跌破10%，9月为9.1%，这是自2009年5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的较低增幅。

再者，从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月同比累计名义增长率，在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09年6月上升到高峰，为33.6%。至2009年12月，一直保持在30%略高。随后，从2010年2月至2011年12月，两年内，比较平稳降到23%至26%左右。2012年以来，各月进一步降到20%左右。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月同比累计名义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10年5月达到38.2%的高峰。随后下滑至2012年9月，降到15.7%的低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方面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有外部原因，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发酵。有国内原因，我国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要素供给（资源、环境、劳动力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原因。这里，我们就当前与未来中期（2013至2017年5年左右）我国经济走势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前景展望与对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现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准确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年至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至12%的区间内，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问题时，其上下限是否都要同时下移呢？

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其上下限的下移可以不对称。在最近5年内，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下移2至3个百分点，即其上限由12%降到10%以内，把握在9%左右为宜，而其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

为什么首先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呢？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往往容易过高。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由此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经济增速过高，会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

为什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限8%可以暂时不动呢？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难以持续，但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率如果低于8%，经济运行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其一，经济增速偏低，会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经济增速，从需求面反映出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和销售，使生产能力和各种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企业利润下滑，设备投资下降，并进而影响就业的扩大。其二，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都会遇到困难。其三，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经济发展和增长是提高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四，市场上容易产生悲观预期，不利于市场信心的稳定。所以，经济增速偏低，会恶化经济结构，也会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

实践表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太高，高出10%，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增速偏低，低于8%，也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也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大幅度的突变过程，还是一个可以逐步渐进的过程？有学者提出，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之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时，都是大幅下降约30%至40%。我国将在2015年左右，潜在经济增长率由过去10%的高速降到6%至7%的中速，降幅亦为30%至40%，下一个较大台阶。然而，我们仔细研究国际经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可表现为3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年均9%以上，降为4%左右。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经济增长率由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年均9%左右，降到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的8%左右，再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左右。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移。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震荡。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说，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特别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就为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一定较快增长提供了较大空间。以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来看，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人均GDP水平，可以分为以下4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人均GDP超过12400美元，有3个地区，天津、上海、北京，全都为东部地区。

第二类地区：人均GDP近6000美元（也就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32美元）至9500美元，有8个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6个（江苏、浙江、辽宁、广东、山东、福建），西部地区1个（内蒙古），中部地区1个（吉林）。

第三类地区：人均GDP在4000美元至5300美元，有14个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6个（湖北、黑龙江、山西、湖南、河南、江西），西部地区6个（重庆、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四川），还有东部地区2个（河北、海南）。

第四类地区：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有6个地区，除中部地区1个（安徽）之外，主要是西部地区5个（广西、西藏、甘肃、云南、贵州）。

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对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分组标准，1247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4036至12475美元为上中等经济体，1026至4035美元为下中等经济体，102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经济体。大体参照这个标准，我国上述第一类地区已接近或基本达到高收入水平，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大体处于上中等水平，第四类地区大体处于下中等水平。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以上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部分地区），随着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已逐步下降，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以上第三、四类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经济发展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全国总体上看，虽然潜在经济增长率要下降，但未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有利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的平滑化。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经济增速的波动态势将会怎样？是不是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年度间仍会有高低起伏波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内（5年至10年左右），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鉴于我国长期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力求使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使经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这既不是简单的大落又大起的“V”形或“U”形轨迹，也不是大落之后很长时间内恢复不起来的“L”形轨迹。具体说，在我国GDP增长率2010年为10.4%后，2011年回落到9.3%，2012年预计进一步回落至7.8%左右，而2013年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小幅回升至8.2%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适度而不过高，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小幅上升。

之所以预计2013年GDP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是从中期内经济波动、物价变动与宏观调控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出发得出的分析。近几年来，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宏观调控侧重点变化的“四部曲”反映出来，即由“双防”到“保增长”，再到“稳物价”，又到“稳增长”。

“双防”。2007年，我国经济运行偏快，GDP增长率高达14.2%，物价开始逐月攀升，由2007年1月2.2%，一路攀升到12月6.5%和2008年2月8.7%的高峰。在这种形势下，2007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双防”，即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双防”任务下，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转向较为严厉的从紧的货币政策。

“保增长”。随着上述宏观调控政策的趋紧，加上2008年9月袭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工业生产迅速下滑，由2008年3月17.8%猛降到2009年1至2月3.8%的低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1至2月累计计算，下同）。与此同时，物价迅速下降，由2008年2月8.7%的高峰降到2009年2月1.6%。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宏观调控的侧重点转向“保增长”。宏观调控两大政策都转换方向。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稳物价”。2009年货币信贷超常增长和经济迅速回升，滞后反应是2010年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攀升至5.1%的新高。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而货币政策转为“稳健”。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伴随物价涨幅的回落，经济增速亦在回落。

“稳增长”。在货币信贷趋紧的形势下，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加上外需不振，经济增速超预期进一步回落。2012年5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的意外冲击，2012年第三季度工业生产和GDP增长率可筑底，第四季度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2013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理论探析

经济转型发展面临新机遇

梅家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转型升级的紧迫性、艰巨性与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剧变力、震荡力广度交融。要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经过30多年不懈奋斗，我们已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迈上5000美元台阶，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既拥有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欧债危机仍处于高危阶段，发达经济体仍处于衰退边缘，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干扰和影响加大，也必然通过多渠道传导给我国。综上所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3个显著特点：一是政治周期、商业周期与地区动荡三者叠加，多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不断升级，日趋白热化。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在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难度加大。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与此同时，受信心缺失和去杠杆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继续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发达国家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尚未真正启动，新能源和低碳、生物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进展缓慢，制约着经济复苏的步伐。

从国内环境看，2012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还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仍然艰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与此同时，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加上成本推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离不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把握好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离不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也离不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只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重大战略机遇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发展才能迎来新契机，孕育新希望。

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牢牢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经济社会得以健康、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调整需求结构，着力提高社会最终消费在内需中的比例。要尽快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解决居民住行困难和消费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要注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较大幅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覆盖范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加快解决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开拓国内消费投资增长的广阔空间；要全面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和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大力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要根据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在调整、转型中科学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要着力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功能。要充分激发和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中国能与世界主要国家同步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当前尚属首次，这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走出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科技振兴之路。与此同时，还要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上要依靠深化改革，依靠市场体制机制的保障。要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体制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以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健全和完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责，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建立健全法制、透明、公正、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要加快企业改革，特别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总之，要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比如，政府要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转型，企业要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转型，等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战略重点，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要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必须看到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书评

探寻转型期财政改革发展之路

——评财政部综合司徐利博士新作《中国财政热点问题研究》

厉以宁

这是一本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财政学专著。书中对宏观税负、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经济热点问题的阐述，对财政政策效应评价及财税改革模拟分析等财政难点问题的剖析，独辟蹊径，颇有见地。这与本书作者多年来在实际工作部门工作有关。

近年来，我始终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思考，这个问题是：中国当前正处于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一方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两种转型重叠在一起。两种转型同样重要，同样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因此，现阶段中国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有利于双重转型的实现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财政问题也应该如此。像宏观税负、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度等等，既要考虑到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需要，也要考虑到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体制的要求。没有广阔的视野，没有通盘设计的思路是难以促进双重转型的。作为一个财政学研究者，必须有战略眼光，才能在这个领域内有所突破，有所建树。本书引导我们对财经领域一些广为流传的学术观点重新进行思考。作者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潜心钻研的态度，值得钦佩。

当前，我国正处于稳健发展和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正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双重转型任务，所以另一个问题很自然地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究竟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和改革哪一项应该放在首位的关系？根据1979年以来30多年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经验，不难得出如下的论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无疑十分重要，应放在首位。换言之，应当是改革探路、改革开路。1979年至1982年几年内，如果不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经济会有这么快的发展么？如果不进行产权界定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企业能这样顺利地发展么？进入新世纪后，如果没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区能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么？

那么，如何进一步完善政策，推进改革？是简单地搬用国外的做法，还是对国内外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国际比较？是淹没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之中，还是抛却表象，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与实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双重转型的重叠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没有任何先例可援。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任何改革，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所以，一个研究者，以理论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不断升华理论，使之本土化，既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更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了解国情。希望国内实际工作部门人员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为推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版编辑 裴珍珍